

对吴老的片断回忆

胡善权

在地理上，铁山山脉纵贯荣县，构成岷江和沱江的分水岭。荣县西北路大部地区及东南路小部地区处在丛山峻岭中，道路崎岖，交通困难，远离成渝大道，更远离川陕大道。地处偏僻，民风古朴，有世外桃源之称。接受外省、外国的新事物、新文化，比较难些，比较迟些。家住群山中的部份荣县人的语音，还残存着一些古音。

在思想上，荣县上层社会，特别其中的知识界，崇拜宋明理学。黄书年、李春需两位学识渊博，品德高尚的举人，以理学的要求，作为言行的标准。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。他们在荣县长书院多年，不仅弟子满荣州，其他州、县来学者也不少。他们是言行一致的真君子，不是言行脱节的假理学、伪君子。理学的影响在荣县社会是普遍的、深远的。其影响还超越了荣县的地域范围。

到了明清两代，佛教的势力在荣县也是巨大的。庙宇不少，高僧辈出。明末的莲花寺（在现时的莲花乡）僧侣之多，为全县各庙之冠。今天还流传着这样一句关于莲花寺的谚语：大和尚五万五，小和尚不消数。还组织众多僧兵以自卫。知识界信仰佛教者，也大有人在。佛教对荣县社会的影响，也是普遍的、深远的。

背起这两个理学、佛教沉重包袱的古老的荣县社会，恰如死水一潭。向这潭死水，勇敢地投掷第一块巨石的人物，就是年青时的吴玉章。巨石、潭水相互摩擦，发出一声巨响，同时激起层

层巨波。巨响响出了县界，响出了省界，也响出了国界。巨波波出了县界，波出了省界，也波出了国界。

着意维新变法，无心猎取功名。1902年，吴玉章府考落第，作诗（七绝）述怀。亲、友作诗唱和。有的惋惜，有的讽谏，更多的是赞许、敬佩。述怀诗传诵一时，至今还有人记得两句的大意：

变法维新关国是，功名馀事等浮云。

1902年12月，吴玉章考入开办在泸州的经纬学堂。学堂极其腐败，正如吴老在回忆录中所说，“挂的是‘新学’的羊头，卖的是‘旧学’的狗肉。它竟把《仪礼》当作一门课程来教学，……大讲其封建的礼教，……“我只住了十多天便愤而弃学回家。”包括吴老在内的一些进步学生，作诗填词，加以揭露，有两句诗传诵至今：“经纬学堂何所有？招牌新学旧东西。”校长是荣县同乡、清朝翰林赵熙，他指责吴玉章的行为是破坏所谓“纲常”的叛逆行为，从此以后，对这位“叛逆”的学生，成见极深。

辛亥革命后，民国时期，在赵熙主持下，编写的荣县志，对荣县在辛亥革命中首先起义、并首先建立独立政权，只字不提，更无系统的叙述。仅在成学法国者这标题下，写上吴永珊三字，好像辛亥年吴玉章同荣县的革命活动，毫无关系。

但吴老对这位乡先辈、过去的校长是有礼貌的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1938年，吴老回到荣县时，表示要去看望赵熙，有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劝阻吴老。吴老指出，抗战要团结，团结的人越多越好。吴老接受了不亲自看望的意见，托一位同赵熙相熟的

人，送去一张名片。赵熙很高兴，小小名片，却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。

据说关于送名片，还有一个插曲：送名片的人没有事先征得吴老的同意，独出心裁，杜撰说词，其大意是：怕老师余怒未熄，不便前来，托我送上名片，表示敬意。赵熙听后，叹气一声，说道：如果戊戌变法成功，辛亥年推翻清朝，不会那样容易（大意）。言外之意，认为吴老那时主张维新变法是正确的。

自唐代以来，女子缠脚已有一千年的历史。在社会上，已形成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观念：女子的美丑，以脚的大小为标准，越小越美，越大越丑。当时还有一句常为人们引用的谚语：“脚大不知丑”。辛亥革命后，甚至今天，也还有人使用这句谚语，以丑化没有自知之明的人。

吴玉章“轻视功名”、“离开经纬”的革命行动，是对社会上层的巨大冲击，中下层受到的震动则较小。吴玉章主张侄女放足，倡导天足论，是对整个社会的巨大冲击。社会的每一家、每个人都受这种冲击波的剧烈影响。因为关系到所有男青年选择终身伴侣的标准问题，关系到所有女青年愿否放足、能否放足的问题，也关系到做父母的人选择媳妇标准的问题（因为父母包办儿、女婚姻），也关系到父母愿否、准否女儿放足的问题。

有些顽固分子非笑天足论是“奇谈怪论”、“妖言惑众”……。他们对敢于向传统恶习（缠足）坚决挑战的人，诽谤为“狂人”。但当时进步分子则尊所谓狂人为无畏英雄，誉为时代先驱。

1903年到1911年的8年间，吴玉章除组织、筹备刺杀摄政王及

策划、参加广州起义外，还有如下重要活动：

吴玉章同其他留日四川学生，从东京寄回四川一篇《劝游学书》。又共同致函四川提学使方旭，建议：每县以官费派人到日本留学。这两篇文章起了很大作用。其他各省留日学生也有不少仿效的。1903年，四川留学生约三十人，1905年，最多时就增加到二、三千人。各省留日学生总数达万人以上。

吴玉章坚决地谢绝了同学们的好意，宁愿自己过艰苦的生活，把官费让与荣县同乡罗厚常。

1904年元旦，吴玉章所住的成城学校悬挂的万国旗中竟没有中国国旗。吴玉章便领导中国同学坚决斗争，要求校方道歉并纠正错误。学校当局只得屈服。学校平时对吴玉章多方照顾，但吴玉章从来把民族大义看得至高无上，在有关国家荣辱大事面前，就公而忘私了。

1905年，团结留日学生参加反对日本政府的《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》的尖锐斗争。这场斗争规模巨大，几乎所有中国留日学生都卷入了。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。日本政界内部也因此发生了波澜壮阔的政潮，反对派向执政党大肆攻击。正在形势有利的时候，领导这次运动的留日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却都已星散。吴玉章就把责任担负起来，会同胡瑛、范源濂收拾残局，日本政府被迫答应了十多项条件，承认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的合法存在的权利。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，在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后，适时地结束了。

喻云纪（黄花岗烈士之一）之弟喻华伟，在云南边区干崖从事革命活动，忽患重病，无钱治疗，在东京的喻云纪束手无策。吴玉章闻讯，立刻主动在同志中，募捐三百元汇去。喻云纪非常感激，极其激动，从而加入同盟会，从一个公子哥儿一变而为无畏的视死如归的革命战士，在思想、生活各方面，判若两人。

回扣在旧社会商场中，照例归买方私人所有。但吴玉章在日

买军火，所得回扣作为公款储存起来，做同盟会的革命活动经费。后来被一个名叫黎仲实的同盟会员借口救汪精卫，把回扣骗去了。正如吴老在回忆录中所说：“我为革命买军火，从来没有拿过回扣，并以拿回扣为可耻。……”

日本政府接受清朝政府的要求，查禁《四川》杂志。日本有关法院起诉，应由现任编辑兼发行人廖希贤出庭受审，但他不肯去，把责任推在前任编辑兼发行人的吴玉章身上。当时人们很为不平，童慎如坚决不让吴玉章去日本法院。但吴玉章认为：“见义不为，无勇也”。开庭那天，毅然出席。大家很为感动，事先为吴玉章请一位有名的日本律师。法院以案情严重，禁止旁听。大家非常愤怒，并为吴玉章担心，但又无可如何，只好在外等候。等候的人们正心情急切，度日如年的时候忽然看见吴玉章平安地走出法庭，一齐大声欢呼，热烈鼓掌，表示祝贺和敬佩。

由于上述一系列的高尚行为，吴玉章在同盟会内外的声望更高了。也为同盟会在国内外的高大的革命形象，增加了光彩。

袁世凯窃国成功，做了民国的大总统。他利用高官厚禄以收买、分化、瓦解同盟会员。一些革命投机分子也就软化、屈服、投降了。1912年吴玉章却坚决拒绝了袁世凯要任命他作四川宣慰使的官职。但为了避免川民涂炭，为桑梓做点事，只以个人名义返川一行，调解川事。

1917年底，熊克武驱逐了刘存厚，统一了四川，熊任四川督军，杨庶堪任四川省长。原来孙中山主张吴玉章做四川省长，熊克武、但懋辛以论功行赏为理由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。但吴玉章为了更亲密地把同盟会的四川同志团结起来，让统一了的四川日

益巩固，作为革命根据地，恳切谢绝，并大力推荐杨庶堪。

吴玉章在日本一边留学，一边革命，变卖了部份祖遗产业。辛亥革命后，同盟会四川革命有一笔活动费，拨出部份，按照时价，买回吴玉章家里卖了的祖业，并为吴玉章新建一条石板路，从双石乡到吴玉章住家的蔡家堰，全长八华里。赎地、修路这两件事，事前没有让吴玉章知道，更没有得到他的同意。正在打算培修（实为改建）吴玉章的住宅的时候，吴玉章知道了，马上坚决制止。

辛亥革命前，通过吴玉章的直接的、间接的影响，加入同盟会的人不少。

北伐战争（1926年）前后，吴玉章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，又任国民政府秘书长，联系面更宽了，相识的人更多了。通过吴玉章的直接的、间接的影响，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行列的人就更多了。吴玉章对青年人参加革命，关心周到异常：张蔚文、张翰芬请吴玉章介绍到黄埔军校学习，吴玉章同他们谈话后，要他们改换名字，以免连累自己的亲人，并给他们改名：张蔚文改为张趣横、张翰芬改为张翰飞。曾莱1926年到武汉会见老校长吴玉章后，吴玉章介绍他到教导队工作。后来曾莱回川领导农民运动，成为农运的著名领导人。

抗战（1937年）爆发后，1938，吴玉章回到家乡荣县，有一次对亲友谈话，其大意是：我这次回来，没有给大家带回什么东西，只带回了勇气，抗战的勇气，到前线的勇气，到敌后的勇气。在辛亥革命及北伐战争中，我们荣县人贡献很大。在今天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，我相信我们荣县人，特别是青年人，会同样做出很大的贡献。……

由于吴玉章的宣传、鼓舞、教育，确有很多荣县青年，奔赴

抗日战线，没有辜负吴老的期望。

抗战期中，吴老在重庆的时候，一天清早刚起床，正在洗脸，看见他的侄孙吴柏修偕同笔者来看望他，兴致勃勃地对吴柏修及笔者说：“昨晚做了个关于教育的好梦，高兴极了，忽然惊醒。”吴老梦见幼儿教育全国普及了，中学教育全国普及了。中国人的文化水平，不低于高中水平。中国不但早已全部扫除了文盲，而且大学生在人口中的百分比，也居世界前茅。吴玉章还指出：每个老师，既要教书，更要教人。把教人摆在教师任务的首位。有知识，无品德，是为虎添翼，对社会的危害更大。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位教师。成年人是未成年人的教师。总之，一切教师都必须把品德教育摆在教师任务的首要地位。而且进行品德教育，必须以身作则，因为身教者从，言教者讼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其说服力是无比的。品德教育搞得好，就能教出一批不为旧社会恶习所同化的人，如荣县的谷醒华、丁硕章……就是这样的人物。他们出污泥而不染，具有鲁迅所说的韧性战斗精神。

抗战期中的中外记者招待会：

从1927年冬到1938年春的十年以上的时期中，吴玉章长期在苏联从事教育、文化工作。九一八事变后，在华侨工人中推进抗日活动。1935年，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，同年到法国办《救国时报》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1937年，往欧洲作抗日宣传工作。1938年，在伦敦参加反侵略的世界和平大会。因此，吴玉章在国际上，特别在国际舆论界，是一位有名望的人物。

这次记者招待会是在1938年，天气还有点热的时候在重庆沙利文餐馆举行的。到会的中外记者数十人。笔者作为济川公报的

记者被邀参加。

吴玉章主持招待会。他衣着俭朴，平易近人，学者风度，谈吐高妙。

外国记者主要围绕抗战前途、国共合作提出问题。他们提问的态度和措词，都对吴老表示敬重。一位法国记者，提问题前，首先表示敬意，略谓：“吴先生是新闻界的老前辈，在先生面前，我只能是一个小学生，要向吴先生请教。……”

吴老邀请胡宗宏做翻译。散会时，胡宗宏代表主人，送路透社记者史密斯（Smith）到餐馆大门。当他们到楼口时，迎面吹来一股凉爽的微风。史密斯便说：“微风可爱！（The breeze is favourable）”胡宗宏答道：“它是为了你和我！（It is for you and me!）”史密斯大笑不已，并停步双手紧握胡宗宏的双手。他们缓步到大门时，史密斯极有礼貌地告辞而去。

此后，吴老和史密斯曾多次约请胡宗宏当译员。胡宗宏与史密斯闲谈时，问他对吴老的印象，他说：“一位真诚的共产党员、一位渊博的学者（a true communist、a learned man）”

解放后的1950年，吴柏修从四川到北京，向吴老汇报家乡状况后，吴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：“胡宗宏现时在那里？他学土木工程，现时搞建设，急需建设人材。”吴柏修告以抗战还未胜利时，他已病死。吴老闻讯，一再叹息。

自贡首任市长曹任远的自述

曹利生整理

我于1893年12月12日出生于自流井檀木林，排行第四。出生的次年即逢中日甲午战争。清庭的腐败无能、北洋海军的覆灭、马关条约的屈辱，使我童年时代就感受到民族的灾难与国家的奇耻。四岁受先祖父的启蒙教育。五岁入大槐桶私塾，六岁就读于石塔上曹老师的私塾学堂。曹老师品学兼优，教学认真，为同学们所敬爱。从师两年，深受教益。犹记七岁时曾抱一南瓜赠送先生以示敬意，不慎途中跌破。先生亦欣然接受，并询问我是否跌伤，恐误学业。

1901年，八岁。我祖父因办盐井屡遭失败，父辈三房分居，家庭经济日趋困难。我三叔父曹笃(叔实)从川南经纬学堂毕业回家，执教于自流井板仓坝树人学堂，三叔仁慈，见我童年失学，怆然有感，随即为我买书，并嘱我入树人学堂读书，开始接受正式教育，王氏宗祠创办的树人学堂，教师中有陈健仁、伍孟勉、胡继常等都是学识渊博勤恳教学的老师。同学中有二十余岁的王祇初。我年仅八岁，是同学中最年幼的。当时学校所讲动、植物学，都认为稀奇，是新鲜的科学名词。

1902年，九岁。随我三叔的教学工作变动，转入富顺县第二小学。其时，是戊戌政变后第四年，满清王朝迫于舆论民情之压力，伪装预备立宪，无非迷惑国人耳目而已。所谓富顺第二小学者，还是四川全省开办的第二个小学。不仅被当时政府歧视，又因社会风气未开，还遭到地方保守势力的攻击迫害。为此，在校

学生还须练习武术以自卫。富顺县二小的武术教师高笃臣，是一位文武兼资的老师，是戊戌六君子刘光第的同学好友。他不仅热心于学校事务，还用新的思想影响同学。我还未满十岁的学生，能学到科学知识感到新奇，又能练习武术更觉得得意。当时富顺县知事徐樾虽系维新派徐谦的胞兄，但对新制教育异常仇视。县二小教员谢持、曹笃、伍孟勉等都被迫辞去教职。另组私立先志学堂，仅办一年，亦自行解散。他们以教育唤醒国人，谋求富强的理想亦随之破灭。

1905年，我已十二岁，小学尚未毕业。适逢富顺县十字岭开办县立中学，（即今富二中前身）我即考入该校。该校中文教员高轮九系高笃臣先生之兄，教学严格，常批评我文理很差，但我耐心辅导，使我努力奋进，成绩迅速提高。同年，谢持先生应聘任四川劝业道文案（秘书），赴蓉时经自流井到我家告知：原川南经纬学堂教员周善培、周孝怀正在成都筹办商矿实业学堂，嘱我投考。我随即赴蓉至西御街与谢持先生妹丈郭仲执先生同住。当时规定报考年龄为十五岁至十八岁，我仅十二岁，考生一千八百余人，仅录取九十名，自知无望，竟侥幸入选，名列八十九，最后一名为满族添续，真算勉强入学了。该校学、膳费很高。一年需银一百余两。我读书一年，家庭就感到无力支持了，正在困难中，幸亏王宝堂还我家旧债三百两银子，次年才由我二哥利成送我到成都继续求学。为赶入学时间，夜行六十余里，到威远龙会镇，改乘小轿，刚由龙会镇南端走至北端，我已疲劳过甚入睡，而轿夫竟撂下轿子找大烟馆过瘾去了。一觉醒来天已中午，才又登程。

商矿实业学堂有日本教师二、三人，其余教师一般都是留日的中专毕业生，师资程度不齐，只能使我们略懂一些科学门径而已。

四川总督赵尔丰因成都优级师范（即通省师范）与中等工业

学堂合并为中等工业学校，并责令商矿实业学堂改隶四川提学使。适值光绪与西太后先后逝世，溥仪嗣位，改元宣统。当局政见不一，学生思想引起波动而酿成学潮，纷纷退学，我亦退学回家。父母对此十分忧虑，为避免追赔学费，我曾一度改名曹炯。

（以后未用）

1908年，我十五岁，四川劝业道拟选送一批留学生赴日本学农，名额20名。谢持先生又来家嘱我应考，幸被录取，得到公费留学机会。当时规定，预科两年，本科三年，预科学费每年250元，本科500元。如能提前考入本科，仍给两年预科的学膳费。我到日本后，开始学习日文，仅八个月时间即入东京私立农业大学。

1909年，我年16岁。我们同行留学生由神户登岸，人人均能遵守社会秩序，不敢随地吐痰，唯恐有失国体。到东京后，见日本小学生每日上课时都很守纪律，而且自觉排成行列在街上行走，服装整洁，秩序井然，十分可爱，不禁使人回想国内读书环境，两不相同，差别甚大。

当时日本学制规定，中学毕业后必须三年预科才能升入大学，而我所考入的农业大学，实际只有专科水平。日本教育不偏于理论而重实践，重视师资，教师均有较高水平，可惜我基础知识差，理论上受益少。但在实践中，如拉车、耕地都要求能赶上农民。实习作业每个学生都分配有一定的耕地面积，操作有快有慢，先完成的同学在一旁休息等待，绝不催促、抱怨，相反倒能促进后完成者自觉地赶上来。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培养我的信心，一步步赶上同学的。

在日本留学期间，我了解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是藩阀统治，略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。明治天皇以武力统一国家，只有长州和萨州未经武力征讨，而是互相妥协的。其后长州和萨州演化为陆、海军两个系统，是为后来军阀专权的帝国主义根源。

1910年，我17岁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。

1911年，我进入农业大学的第二年，四月国内发动了广州起义，同年十月十四日，发动了武昌起义，史称辛亥革命，川汉铁路本属四川商办，清政府不顾人民反对，悍然宣布将商办的川汉铁路收回国有，因此激起四川保路同志会革命运动的爆发，全国革命掀起高潮，日本留学生全体罢学归国。我亦于是年经上海回到重庆。其时四川已成立了两个军政府，成都由罗纶、蒲殿俊负责；重庆以张培爵（烈武）夏之时主持。经双方调和，从顾全革命团结出发，进行合并，渝方担任副职。我即随军政府由渝赴蓉。途经乐山时，地方人士为慰劳军政府赴蓉人员，送来两桌“八大碗”酒席，事后受到方潮珍的严厉批评，认为擅取民间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纪律所不容的，足见当时同盟会员洁身奉公的革命风气。

我到成都后，川局初告平定，稽勋局（考核勋绩的主考机关）要我继续东渡求学。因此在蓉不久复去日本，攻读于东京农业大学。学农对我兴趣不深，乃改名任远转入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染色科专业。从此我致力于化学基础与应用化学的研究。

袁世凯称帝前后，同盟会中同志鉴于袁氏野心毕露，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共和又不能即时实现，内部意见分歧，一派以黄兴为主，主张与岑春萱妥协，自行作出广泛联系。即是后来政学系一派的根源；而国内多数革命党人和东京各方人士，海外华侨则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继续革命。因此，1915年中山先生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，以陈其美任总部长住上海，联络各地革命同志，居正任党务部长，胡汉民任政治部长。凡同盟会员志愿入党者，都须从新宣誓，加盖指印，一部份人以盖指印而不愿参加，余亦于此时加入中华革命党。

1916年上半年，我在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毕业，正准备回国时，中山先生把讨袁人事安排的委任状，全部交给我从东京

带回上海。还记得袁世凯当政期间，曾多次派代表到东京欺骗留学生妄图遏止反袁活动，但都被学生驱逐回国。尤其袁氏屈从日本廿一条亡国要求的不平等条约，更激起爱国学生的强烈反对。我以中华革命党员身份，反袁活动每役必从，但一直未放松学习。

1916年我回上海不久，即闻陈其美被刺消息，我闻讯时立即赶到尚贤堂探视，陈遗体还躺在地上。同时我三叔（曹笃）因救陈擒获刺客受枪伤住院，我进医院尽守护之责。同年冬，我回四川家乡结婚，旋应聘任成都工业高等学堂教员。此时滇军与川军在蓉发生冲突，我住处被乱军劫掠一空，不能安心教学，又萌出国深造之意。于是又去上海转道北京。坐席未安，忽逢张勋复辟，于是同谢持先生再返上海，筹措费用二千余元，作赴美留学之用。当时美金一元只合中国银元九角多一点。

1917年，我由上海乘轮船经横滨至檀香山，转旧金山登岸。途经太平洋时，曾见巨鲸喷水高达数丈，船过鲸侧，宛若小丘，海阔天空，非常壮观。我到旧金山所见美国人的生活，略如上海，但妇女衣着极不协调。女人夏天着长袜或赤足，而颈部大多围一狐皮。公路多为块石镶拼，路面亦不美观。自旧金山改乘火车至米希根省之amaton的米希根大学，我在该校攻读化学，此间曾与张真儒相见，张曾任川大校长。

1918年我转入芝加哥大学，不久，又转入威士康辛大学，即在该校作研究生。约两年。获硕士学位。美国人读书，很注重教授名望，并以之作为选择的第一标准。我在校肄业十分重视基础理论，因之能顺利通过硕士考试。其考试办法为大学组织的考试委员会主持，授业教授是当然口试人之一，口试答辩合格后，由被考者的授业教授致祝词，即告结束。

美国的大学，要求学生绝对相信老师的理论学说，不允许怀疑。说到科学方面的“离解作用”这一普通的基本理论问题，芝

加哥大学就写得非常清楚了，但威士康辛大学的教授不仅不重视，而且持否定态度。据此可见当时美国的科学水平并不很高。

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在华盛顿召开和平会议。我亦完成在美学业转赴欧洲，到德国留学，途经华盛顿，大家见我通晓日、英、德三国语言，要我以记者身份进入会场采访。华盛顿会议的宗旨本应主张世界和平，作有益于人类的贡献，但与会国所提的问题都各自为自己国家利益说话。弱国无外交，从来如此，以致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在会后受到中国侨民当面的责骂。一个人只有离开祖国踏上别国的土地时才能更深切地感到国家观念，民族意识高于一切。

美国人的生活一般都很轻松，到教堂做祷告也被认为是娱乐。平时喜欢划船、野餐、游泳、跳舞、读书等等兼有各种爱好，颇似中国人的清闲生活。绝少打架斗咀的习惯。在公共场所如遇见妇女，男子即主动脱帽以示敬意，虽黑人妇女亦然。这是六十余年前所见，不知今日尚有此遗风否？

我离美赴欧，由纽约出发，航程十余日始由汉堡登岸，至柏林小住后转巴比伦即省之柏林大学。该校化学教授 Busaheh 在德国化学界颇负盛名，故往该校求学。德国国民风强悍，恩怨分明。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在协约国一方，对我国尚存敌意。中国留学生只许听讲，不准作研究试验。为此我有离德之意。Busaheh 教授有一得意学生，年仅二十岁已得博士学位，与我感情较好，他说：你既来德国求学，又何必无所获而离开呢？我告诉他：德中两国人民历来感情不坏，即以世界大战期中而论，德国军队在中国被俘，中国政府并不虐待反而优遇，吃西餐大菜，住高楼大厦，中国人民如此优容宽待，但中国留学生却遭受这般敌视，我又怎能住下去呢？年轻的博士说：果真如此，那就是德国方面屈礼了。你的教授有几个朋友刚从中国回来，待我探听后再谈。博士后来告诉我。教授从他的朋友处

证实了我的谈话，十分高兴。因此我才参与各项研究试验，并到工厂实习。从此我更抓紧读书实习的机会，并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留学读书竟有如此艰难者，总的来说，还是由于我们国家太弱，以致遭到如此的歧视。为国家富强，为民族争光，是重于自己的生命的。

当时，德国的生活费用还不高，一餐之费不过三、四角钱。战后西方各国正处于通货膨胀之际，美元、马克价格甚低，中国币价值高，因此，我的留学经费较为充裕。我喜欢游历，走过很多地方，开阔不少眼界。德国西南部地区人民轻财好客，颇有中国人的风格。

我留德的三、四年中，德国城乡矛盾非常严重，农民不把粮食供给城市，社会很不安定，当希特勒发动各大城市游行示威之际，友人都劝我下乡暂避，一到农村，见农民生活普遍都好，每餐都是火腿、面包、牛奶、可可，却不卖给城市居民。柏林城市中心在极度困难时，竟有胖人失踪，在地窖中发现人体骨架，真是骇人听闻。我在乡下还有人骂，说是来乡间吃他们粮食来的。而且说东方人天性野蛮，连天真无瑕的小孩都不爱等等，因此对我常以白眼相待。经过一段时间，见中国留学生礼貌文明，才打破了他们过去的一切偏见。记得当时德国通货膨胀时，几小时物价上涨到一倍多。德国政府内债外债累累，经济面临崩溃。但经不长时间就改变了经济的困境。其方法是发展生产，鼓励货物免税出口，所收取的外汇由政府提取百分之三十换发新币，于是新币信誉倍增，不啻硬币，国家财政日裕，外债逐渐偿清。

我国一九二四年，广州中央银行创办之初仅有基金二十万元。修建房屋，印发纸币，均在廿万元内开支，当时政府税收不收银元，而收中央银行的纸币，银行又用银元折价以换纸币，纸币身价成倍提高，银行资本随之增大，政府财政得以充裕，这几乎与战后德国的办法无甚差异，在当时既无损于民，又有利于

国，及后北伐的经费充裕也有很大关系，是否完全这样，只有靠经济专家才更清楚。

我于1924年在德国alcon学校取得博士学位，结束了学生时代的生活，岁月催人，已逾而立之年矣。从德国取道法国回国时，我在巴黎遇见王宠惠、郑玉秀等人，应邀参观了巴黎博物馆、凯旋门和巴黎公社遗迹。我了解到旧社会上海四马路的情况，巴黎同样也有，欧洲文化，有值得羡慕的地方，但同祖国的北京相比，其雄伟气魄，美丽庄严，欧美任何国家都是不能相比拟的。

1924年夏天，我从巴黎经马赛、印度回国途中，在香港见一青年华侨携带破旧猎枪一支，被海关人员强行扣留，许多中国人都说，已不堪用的破猎枪，不能算是危险物品，海关人员非但不理，反而威胁说，你们再说，连你们都同样扣留。国势衰弱才会受到帝国主义分子如此凌辱，真使人十分气愤！

我回上海后，住岳丈谢持家，旋因谢老病于广州颐养院，我赴广州探视，应广东大学之聘，任该校教授，兼任大学筹备事宜。其时，初回国内专于教育心切，深感兴趣，在任教的一年中，历经商团叛乱、沙基惨案，我总以保护学生安全，不误学业为主，为之尽力。

1925年，接北京大学交换聘书，并电促北上。我抵京不久，正当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，我虽有社会关系，但我致力于教育事业，总是避免参加社会活动。

1926年，受美国庚子赔款委员会董事会聘请，因而回川转任成都大学教授，校长张澜，曾得到刘湘以川盐款支援办校经费。成大任教期间，我曾兼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和市党部委员，从此与四川军政界人士较多接近。在蓉任教两年中，川省仍由军阀掌握政权，割据分裂、战乱不息，民不聊生，对教育事业尤有不利之影响。

1929年，我应南京中央大学之聘，任该校化学教授，值国共分裂之后，蒋介石独揽大权，号称以三民主义治国，实则营私树党，军事独裁，而与主义背道而驰，遭到党内外的反对。

1930年，一些国民党的同志，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，实行武力倒蒋，我被推担任后方联络工作，以冯玉祥、阎锡山所部为主力军。与蒋军作战，相持不及一年，冯、阎兵力不足，缺乏补给，已无继续作战能力；蒋亦疲惫不堪，不能消灭冯、阎力量。因之，扩大会议同志建议以修改约法，制定建国方略作为解决的条件。其时蒋政权在政治上只能靠胡汉民个人的威望撑持局面；我已参加扩大会议，并受大会委托，携带会议意见去南京与胡汉民协商。我抵南京后先与卢仲琳见面，随即与胡会晤。胡看意见书后说：在我看来，首先解决个人的出路问题，然后再商解决办法。我说：这些人到南京，根据在党的经历，谁都能作官，但我之来京，目的不在于为谁讨官做，而是交换双方意见，走向和平，是为国家前途着想。如果长此任蒋专权独裁，在不久的将来，局势将不堪设想，胡汉民却说，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。我的谈话也就不愿继续下去，就此作罢论。其后，我回成都大学任教。

1931年，接广州电邀参加广州非常会议，始知立法院长胡汉民已被蒋介石非法扣留，拘留于南京汤山。因此，两广以声援胡汉民为由宣布独立，质问蒋非法扣胡，违反约法。要蒋立即下野，引疚辞职以谢国人。蒋乃被迫释胡。及后我回上海，值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，凛于国难当头，南京与两广的对立，由居正从中调和。商定广州设立西南政务委员会，国内形势趋向缓和，表面归于统一，实际仍然相互对抗。

1932年，我在上海得广州急电，要我赴香港晤胡汉民，获悉西南用登记方法决心驱逐蒋介石、汪精卫出党，刷新国民党内部分。此即外间所传的新国民党活动。到达广州后方知我已被选为华北书记长，负责联络华北革命同志，作今后对日抗战的准备工